

二十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巨变与中国社会阶层变化

宋 瑞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迎来了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带来了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一次大调整。新民主主义社会“四个阶级”的社会阶层构成,体现了党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尊重,有效地维护了制度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伴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原先的阶层关系开始出现变化,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结构向社会主义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建国初期社会阶层变化是执政党整合社会阶层利益的过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奠定了阶层关系调整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和阶层关系的重大变化能够平稳和顺利地实现,是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立的结果。建国初期阶层关系变化产生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合乎逻辑地在执政党意识中衍生出维系稳定的思想理念,留下了历史的隐患。

[关键词]历史巨变;社会阶层;变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5-0016-06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而来的新旧社会变动,构成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样一种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重起炉灶的制度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常见的。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深刻的历史巨变中寻求政治秩序的稳定,必须妥善地处置好社会的阶层关系。建国初期的社会阶级阶层变动的过程,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重新整合社会阶层关系的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

发生于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是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起点的。按照党预设的建国路线,在获得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过渡的阶段再转向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反映在社会阶层构造上也呈现出过渡的特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①1949年毛泽东用“人民民主专政”定位国家政权性质时,明确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构成的对象,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②1949年9月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构造以宪章的形式作出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①。这样一种阶层构成,将各种顺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政治力量纳入到国家政权基础的范围。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构成虽然呈现并列的关系,但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明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其重要性与其他几个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不同。二是四个阶级构成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劳动阶级与非劳动阶级的联盟。前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后者是统一战线的联盟。两者性质不同,但都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所必须,巩固这两个联盟是党坚持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中,对于这样一种社会阶层构成的思想认识并不稳定,突出表现的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在党内不时地流露出来。李维汉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建国初期党内有部分同志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早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对统战工作和统战干部瞧不起,甚至说什么‘统战路线,地主路线;民族观点,糊涂观点’。”^②党中央及时地发现这个动向并加以纠正。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不要四面出击”,指出不要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就是对维系社会阶层关系稳定性作出的努力。他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③。这些论述表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层构成虽然具有复杂的一面,但保持稳定则是主要的一面。

阶层关系的稳定在社会剧烈变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制度变革使新旧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各个阶级对新制度的认同,关系到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刚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巩固新生政权的首要目标是集中力量打击旧社会的反动势力,阶层的整合主要是在内部关系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剧烈的制度变革中寻求政治秩序的稳定,决定着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的构成原则。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构成,是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特殊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相适应的。

二、过渡时期社会阶层变化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构成的稳定性随着党的最初发展战略的变化而打破。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先的阶层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它对社会阶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是党执政实践最为重要的阶级基础。建国初期,不仅国营企业的工人由于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一而成为企业的主人,私营企业的工人也作为工人阶级整体的一部分而确立其政治地位。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必须发挥维护工人利益的作用。1952年中财委发布改革旧企业中不合理制度的指示,体现了对工人阶级利益的保护和政治地位的强调。但由于旧中国小农经济占主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工人阶级的人数有限,党的执政基

① 朱训、郑万通主编《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基础并不牢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制约,在五种国民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下,工人队伍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据统计,1949年工人人数为800万左右^①,仅占1949年总人口(54167万)的1.47%,1952年工业企业工人人数为1531万,占总人口的2.66%。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在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过渡时期总路线内涵的指向,既包括三大改造的生产关系革命内容,也包括国家工业化的生产力目标。此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社会阶层变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五计划将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88.8%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建设。”^②除了巨额的工业投资,截止1954年10月,我国与苏联签订了156个项目的重工业建设工程,包括钢铁、有色冶金、动力机器、化工厂等等。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促进了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直接带动了工人数量的增加。

表1 工业企业职工(工人)人数及所占比例

年份	年底总人口 (万人)	第二产业人数 (工业企业工人)	工人在全国总人口中 占的比重
1952	57482	1531	2.66%
1953	58796	1715	2.92%
1954	60266	1882	3.12%
1955	61465	1913	3.11%
1956	62828	2468	3.9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第二,改变农民的政治属性,实现个体私有身份向社会主义集体身份的转变,是农民阶层变化的主要特点。作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农民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广大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拥护首先是从土地改革的受益中建立起来的。土地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主要阶层结构的特征是极少数地主占据农村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处于被压迫剥削的地位,有学者将它称为“地主少、在塔尖,农民多、在塔底”的“宝塔式”阶层结构^③。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党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把土改作为实现财经状况好转的重要措施,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领导农民完成了土改。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社会阶层状况。土地改革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④。这就在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同时,转换了农民的身份,“耕者有其田”的实现使农民的政治属性发生了变化。农民获得土地后,阶层变化的一个新情况是中农成分比重的增大。

① 1949年工人人数809万,见朱秀英、赵金鹏等著《中国工人阶级现状与发展趋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书中认为1949~1957年间,在1949年基础上,工人数平均每年增加280万,1957年为3101万。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③ “宝塔形”、“纺锤形”的概念,参照王瑞芳《新中农崛起后中共阶级政策的调整》,《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④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表2 土改后农村中农化趋势(%)

阶 层	社员户%	贫雇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其他%	总计%	
土改结束时	—	57.1	35.8	3.6	2.6	0.9	100	
1954年末	4.2	29	62.2	2.1	2.5	—	100	

资料来源:赵德鑫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949-1991)》,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06页。

上表反映农民阶层变化的情况很重要,它透露的讯息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农民阶级的利益满足已经超越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实现地位的提升成为新的追求。“新中农的崛起和农村普遍中农化,带来的是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格局。由土改时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即贫雇农占70%以上,地主富农10%以下,演变为土改后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即中农占60-70%以上,贫农占20-30%左右,富农占10%以下。这种新的纺锤形社会结构表明中农在农村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加强。”^①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表现在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变化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因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了政治属性的变化。从数量看,过渡时期农民的人数变化并不明显。统计数据表明,与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相对应,农民人数总体上呈减少的态势,但幅度很小。

表3 城乡从业人员变动(万人)

年份	从业人数	按城乡分		城乡人口占从业人员比例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1952	20729	2486	18243	11.99%	88.01%
1953	21364	2754	18610	12.89%	87.11%
1954	21832	2744	19088	12.57%	87.43%
1955	22328	2802	19526	12.55%	87.45%
1956	23018	2993	20025	13.00%	87.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城乡社会阶层还是存在着流动的事实,总体趋势是城市人口增加,乡村人口减少。表中1953~1954年间的比例反弹,是因为土地改革后从农村转移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剧了原本紧张的城市就业形势。1953年,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返乡,因此出现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上农民人口的微量增加。值得指出的是,考察过渡时期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变化,重要的不在于农民数量的变化,而在于农民身份的改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实现农村组织转变的同时,将广大农民从拥有自己土地的个体身份转变为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身份。这种政治属性的身份变化,是党有意识地改造农民阶层构造的举措,是整合建国初期社会阶层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第三,消灭资产阶级,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阶层结构向社会主义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存在,是中国经济基础决定的,《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的前途,绝不是出于稳定资产阶级的权宜之计,而是符合建国初期经济状况和政治发展客观现实的战略选择。建国初期,国民经济遭到战争破坏,百废待举,针对这种情况,在起草《共同纲领》时刘少奇指出“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

① 王瑞芳《新中农崛起后中共阶级政策的调整》,《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①1949年至1952年,贯彻《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帮助、扶植民族工商业政策,着眼点主要是利用私营企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以更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这段时间内党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侧重于“利用”,对资产阶级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委会四十九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关于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一九四九年,国营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私营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一九五二年,国营约占百分之五十,私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二”^②。从总体来看,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阶段,私营工商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虽然很大,但呈减少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和追逐利益的本质,也从来没有放弃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从三反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限制资产阶级;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1954年宪法在表述上已经与《共同纲领》中关于国体的表述明显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③下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进度。

表4 解放后历年来公私合营工业发展情况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6 改造面
公私合营工业户数	193	294	706	997	1036	1746	3193	64230	99.02%
职工人数(万)	10.54	13.09	16.63	24.78	27.01	53.33	78.5	107.5	98.90%

数据来源:曾壁君、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到1956年,私营工商业者被改造为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的比重达到90%以上。资产阶级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终结了阶级的存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具有自己的特色。

三、建国初期社会阶层变动的历史审视

对一个新建的政权来说,政治秩序稳定与经济恢复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两者事实上也是分不开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但是,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经济发展也无从谈起。亨廷顿指出“成功的革命往往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在一起……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用暴力迅速地摧毁现存政治制度、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建立新的政治制度”^④。亨廷顿所论及的政治动员、政治参与以及制度建设都与政治秩序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社会阶层关系的处置则具有关键意义。

在建国初期社会深刻变动过程中,执政党整合阶层关系涉及到利益调整问题,利益失衡便可能导致政治秩序的破坏。新旧社会交替引起的震荡对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建国初期阶级阶层利益的复杂性在于不稳定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到了个人所有的土地,合作化运动却又要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拿回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资产在社会制度变动之初得到

① 朱训、郑万通主编《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第4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③ 朱训、郑万通主编《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第158页。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保护,而生产资料改造运动则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有偿地将私有财产交给国家。这样一种表现为利益博弈的变化必然带来阶层关系中的复杂矛盾,处置失当就会扰乱社会,出现政治无序化。建国初期社会阶层变化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是政治共识的形成,达到的效果就是政治认同的确立。无论是农民身份的转变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私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奠定了阶层关系调整的基础。阶层利益满足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发挥了消除社会震荡的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和阶层关系的重大变化能够平稳和顺利地实现,是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立的结果。

事物发展总是呈两面性。建国初期社会阶层关系变化在满足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诉求的同时,也留下思想上的后患。1956年以后的历史实践表明,建国初期阶层关系变化产生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合乎逻辑地在执政党意识中衍生出维系稳定的思想理念,强调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仍然延续下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一次次指向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被消灭了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否定了建国初期阶层变化的合理性。造成这个逻辑悖论的结果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但也与建国初期阶层关系变化不无关联。主要表现在未能从阶层变化中进行科学的身份界定。新中国建立前后,民族资产阶级被明确地划入“人民”的范畴,但经过建国初期社会阶层变化后,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反而被模糊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和敌我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应该说是对社会阶层变化的回应。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还是从人民的范畴界定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强调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变成敌我矛盾。这样认识问题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建国初期阶层关系调整后,被实际剥夺了私有生产资料的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作如何的身份界定则未加以说明。一般的说法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了,但个人的肉体没有消灭。虽然对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策上给予了工作安排以及相关待遇的安排,但政治属性并没有给予确定的界定,后来打乱正常政治秩序的错误实践正是栽在了混淆两类矛盾的问题上。值得指出的是,1957年以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的阶级斗争,与建国初期阶层关系的变化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斗争形式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的纲上线,并没有阶层对象的明确指向。“阶级斗争”几乎成为一种“魔咒”,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随意地显现,甚至将它转移到党内,出现所谓“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逻辑混乱,将共产党政治属性非常明确的领域也变为阶级斗争的战场。这种扭曲的实践与建国初期社会阶层关系变动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共党史专业 2009 级硕士生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止耳]